

如何为新词命名？

——论民国初年的“翻译名义”之争

孙晓娅

内容提要 如何“正名”是清末民初翻译界的一个重要问题。章士钊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译音胜于译义的观点，引起一场关于“翻译名义”的争论。虽然音译派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并在实践中逐渐失败，但音译派的翻译策略与文化立场值得分析。音译拒绝采用归化策略，而只是纯粹通过语音转写的方式表现源语言，这种看似消极的“有所不为”其实也是一种“作为”——既不以汉语词汇误读源语言，也不曲解源语言以迎合汉语，彰显的正是互不归化、彼此尊重的文化姿态。这显然体现音译派在民国初年对中西文化主体性和差异性的深刻认识。

晚清以来，国门渐开，中西交通日益频繁，翻译的重要性陡然上升，而如何翻译，包括翻译中的重要任务——对新事物、新概念进行命名——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便指出：“中国旧译之病尽于是矣！虽其中体例严谨，文笔雅驯者，未始无之。而驳杂繁芜，讹谬俚俗，十居六七。”可见这一时期的译介工作并不能令知识界满意。较为严肃的翻译家如严复，对译事之难也是深有体会：“鄙人于译书一道虽自负，于并世诸公未遑多让，然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踟蹰，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曾谈过“正名”的重要与关键：“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但这件事确实又太难，故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的著名牢骚。可见在清末民初，如何为西洋概念确立中文译名，既是不可回避的技术问题，更是重要的译学理论乃至思想史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民国初年一场围绕“翻译名义”而展开的论争，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

1910年，章士钊在《国风报》上发表了《论翻译名义》一文。在文中，他关注的是对名词的翻译，更具体地说，是名词翻译中一个“狭而最要之问题”，即名词音译与意译究竟孰优孰劣。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六个问题：

- (一)以义译名 果能得吻合之译语乎?
- (二)以义译名 弊害何在?
- (三)纵能吻合之译语 果即为适用之译语乎?
- (四)如不能得吻合之译语 吾宁择其近似者 抑将弃掷义译之法乎?
- (五)如欲得义译之良译语 有不可犯者何病?
- (六)以音译名 利弊何在?^④

接着作者自问自答,对这六个问题分别进行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输入西学最力的严复是以意译(义译)法为主,“物竞”、“天演”、“自繇”、“导言”、“名学”、“内籀”、“外籀”等译词皆出自严氏笔下,而严氏此时正在主持学部审定名词馆,可谓风头一时无二。因此,章士钊的发问主要是针对严复。章士钊首先以严复自己提出的“逻辑”(logic)一词为例,否定了意译某些概念的可能性,即“愚谓译事至此,欲于国文中觅取一二字,与原文意义之范围同其广狭,乃属不可能之事”。严复曾提出,应该“先治西文,于以通之,庶几名正理从,于所思言不至棼乱”。但章士钊则认为:“名正理从,谈何容易?即求之西文,且往往而不可必,况欲得之于理想悬殊之吾旧文乎?”显然,在英国攻读政治、逻辑等学科的章士钊,对“名”与“实”、概念与事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他对严复所追求建立的“名正理从”的知识秩序是深表怀疑的。

章士钊指出,以义译名最显著的弊端是“无论选字何如精当,其所译者非原名,乃原名之定义是也”。这样会陷入一个悖论:如果我们用“论理学”、“名学”来翻译“logic”,我们其实是在给“logic”下定义。译者本来是想翻译一个术语,结果却是以定义作为术语。如果我们想让读者了解这样的新术语,就势必要加以解释。那么,这种解释从哪里来呢?如果是在“论理学”、“名学”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其实质不过是循环论证,如“论理学者,论理学也”、“名学者,名学也”,人们得到的只是术语,并没有真正得到定义。如果需要重新寻找新词汇来解释,那么“论理学”、“名学”这样的译名/定义显然是失败的,而且如果意译者最初的译名/定义恰当准确,人们在寻找新词汇加以解释的时候,便无法绕开它们,这就又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章士钊的这一推论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有着很强的思辨性和说服力,成为他日后讨论翻译问题时反复提出的论据。

章士钊接着提出,意译的第二个弊端在于易生歧义、矛盾义:“歧义何以生?乃望文而生之也。盖此种名词,最易使未治其学,或治其学而末精者,本其原有之字义,牵强解之。”也就是说,意译所用的汉语字词,其固有之义必然会干扰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当时报纸滥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术语,与译名容易使人混淆不无关系。学术发展,事物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其定义也须随之变化。如果把“论理学”等不精确的译名固定下来,就会对给出新定义造成障碍;如果想要重新翻译,又会受到前一译名的束缚。例如,严复用“爱智学”译“philosophy”。但“爱智”只是“philosophy”最早期的定义,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其内涵早已经发生变化,并非“爱智”二字之义所能概括,因此章士钊认为这种译法“名为爱智,是谓不智”。应该承认,章士钊对意译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针对第三、四个问题,章士钊回答道:外语当中的一些术语,本身能否成立就值得推敲,对它的翻译即使吻合,也未必就是恰当的译语。他又表示自己并非绝对排斥意译。在找不到非常吻合的译法时,可以取其近似者,而当意译极端困难的时候,可以采取其他方法。他认为,意译中有“断字”、“误会”、“选字不正”、“制名不简洁”等是不应犯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在举例说明这些错误时,他的取材毫无例外都来自严译。作为对比,在文章结尾他分析了音译法的利

弊:

吾国字体与西方迥殊,无法采用他国文字,以音译名即所以补此短也。语其利也,则凡义译之弊,此皆无有,即为其利。至语其害,则人或觉其生硬不可读外,可谓无之。且此不过苦人以取不习,终不得谓之有害。此种苦处,习之既久,将遂安之。佛经名义之不滥者,译音之法乃确为一绝大之保障,至今涅槃、般若等字,未闻有人苦其难读者。故愚以为自非译音万不可通,而义译又予吾以艰窘,吾即当诉之此法。^⑪

这篇文章是章士钊论译名问题的基本纲领,也是他此后讨论翻译的出发点。对当时以严复为代表的翻译方法,章士钊的不满显而易见。尽管他也承认有些简明易懂的概念可以采取意译,但更重要、更基本的一些概念还是以音译为佳。在音译和意译之间,他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为了尽快扭转翻译界以意译为主局面,章士钊对严复的批评可谓相当激烈——他指摘严复用“连珠”译“syllogism”,过于附会,不能满足更精密地介绍西方学理的要求。在另一场合,他又攻击严复将“fallacy”译作“发拉屎”,“翻译术语而如此恶劣,可为喷饭”^⑫。

时隔近一年半之后,供职《民立报》的章士钊在回答读者来信时,重新强调了《论翻译名义》中的观点:对于“logic”这样的词,几乎是不可能从汉语找到合适的字眼来意译,因此只能以音译之,而且这种音译应该是“任取吾国两字标之”,不应有汉语表意的成分在内,“音译西名而同时迁就吾文之义者,乃为劣译”^⑬。章士钊还严厉指责严复殚精竭虑所构思的意译兼音译的方法不过是自作聪明:“严译之乌托邦Utopia,自以为巧夺天工,而记者则直以为与洋奴所写之冰麒麟Ice Cream可以同类而观。”^⑭

或许是因为章士钊当时人微言轻,他对严复的发难并未得到严复本人的回应。然而,在报刊上对于学术声望臻于顶峰、时人交口称赞的严复进行如此不留情面的批评^⑮,不可能不引发争论。张礼轩便投书《民立报》,对章士钊的观点提出质疑。张礼轩认为,音译只可适用于地名、人名及新发明之物名,“因无意义之可求也”;其他有意义之名词,仍以译义为宜,“一则因观念之联络,易于记忆;一则因字面之推求,便于了解。了解者不过明其大意,至原文之界说,无论译音译义,非详加诠释,缀以定义,不能完全明了”^⑯。“logic”译为“名学”或“辨学”,或者“论理学”,读者都可以了解大概,而译为“逻辑”,则“直有不识为何物者矣”。而且由于中国文字中同音字多,音译会造成译名的芜杂不一,不便学习和记忆。所以总体说来,译音不如译义。

时隔不久,张礼轩再次致信章士钊,更深入地批评了章的论点。他先是指出章士钊论证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按照章的观点,翻译名词不应该给名词下定义,而应该译出与原词语相应的“术语”,那么无论意译者选词如何精当,都应该在摒弃之列,这与章士钊所说的采用音译或意译要酌情而定的观点正相冲突,而这正是章士钊论证的漏洞所在。他指出,按照章士钊的推论,“ethics”不能译为“伦理学”,而应该译为“蔼赛”;“psychology”不能译为“心理学”,而应译为“赛考”;“economics”也不应译为“生计学”,而应译为“衣扣”。他甚至还以章士钊多次在文章中使用的“生计学”为例,反问:“不用音译之衣扣,岂与原义同其广狭者?此岂非以其定义为术语者,顾何以应抛弃而不抛弃耶?”^⑰也就是说,章士钊自己在实践中,并没有否定意译词汇的有效性,也并不认为“生计学”这样的意译名词会造成读者理解的障碍。对于章士钊所担心的滥用术语之弊,张礼轩认为“吾人翻译一种科学公之于世,其目的为便于学者明其事理也。惟其如此,故译事当以便于求学为前提,不当因行文者之引用而稍为迁就”^⑱。引用者是否陷于歧义,在于引用者自己的辨别能力,与译者并无关系。章士钊的问题在于“专为避歧义而忘其正

义即因之而难得,专为免吞剥而不知适陷于难于记忆、难于推求之弊。译事之目的何在,未免舍本逐末矣”¹⁹。章士钊推崇的音译典范如佛经中的般若、涅槃,在他看来也是反面典型。正是由于佛经中这些音译名词艰涩难读、难解,真正深通佛学之人才如此之少。他表示:“译书以饬学者,重在普及。而顾专为严其名词之壁垒,是乌可者?”²⁰他在信末总结道:

总之,译事为便于求学,有意义之名词音译之不便处实多,此固无容讳言,故鄙人主张音译只可适用于人名、地名及新发明之物名。至于乱搬术语,其弊由于不学。欲救其弊,使之求学乃为正当方法。为救其弊而音译,先失译事之本旨。即以音译救正之,而其效亦仅矣。²¹

从这封信来看,张礼轩应该对翻译工作并不陌生,甚至有可能亲自从事过翻译实践。他对章士钊的批评更多地是从西学传播、普及的层面出发,以一般读者对译文的阅读经验为依据,并没有什么繁琐的理论,却很符合当时中国读者对译文接受的实际情况。因此,章士钊不得不承认“张君之书,大足以开记者之茅塞”²²,自己虽有不同意见,但也暂时不予置辩了。

不过章士钊并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主持《独立周报》之后,他在第一、二期继续发表读者来信,将《民立报》时期对译名的讨论延续下来。读者李禄骥的来信侧重于翻译实践,主张无论音译或意译,都需要统一译名。他提出“采取习惯”、“迓译原文”、“沿用国语”、“编制字典”、“推求新名”等五项翻译原则。李禄骥代表了当时知识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随着民国的建立,翻译也应有统一的标准。而“兹事重大,非率尔所能办,亦非二三人所能成”²³,因此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负责这一工作,至少应该体现国家的意志。

另一位读者张景芬则继续对章士钊的观点进行批评。他认为译义虽然有弊病,但译音也不完美。后者的问题在于读者连大意都无法从译名上得知。他提出应该由机构来统一译名。意译不能尽善尽美时,由学部或学会加以规定。如果规定的译名不能完全表达原意,可以加以注释,公之于众,使读者的理解不致产生分歧。如果像章士钊那样一味苛求译名精微完美,在实际上是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字字之译义无讹,文字形情口吻,如诗之所谓Inspiration者,虽工笔不能出之纸上也”²⁴。正是由于不同语言文字之间“不可译性”的存在,章士钊对意译的苛求才显得过于书生气,而脱离了实际生活:

故译事太苛,东西文字,将无支字可译,而今日智识输入,既难讳言为幼稚时代,又必为多数不肄西籍者着想,故鄙意宜译其意,不能完全者从其偏而已。此非独利不肄西籍之人也,即留学外国,肄业专门之人,于浏览本国书报之余,亦能稍解他学,脑力不至偏缺,后学及国家根浅者,既得溯其宗义,以解大意,亦不至观国文无意可寻,至于唾弃,所益非浅鲜也。²⁵

章士钊给这位读者的回信颇耐人寻味:

张君持论与记者之本旨并无所忤。记者之主张音译,本非一成不变之说,特以义译确有弊,而其弊又适可以音译矫之,故从而为之词耳。然尽有一义,义音两译,厥弊维均者,于此吾将无择。若音译之弊,浮于义译,亦惟有舍音取义耳。盖音义两译,各有偏至之理,而无独至之理。善译者当权其利害之轻重以为取舍,预储一成见以待之焉,不可也。记者

固主张音译,而非无论何处,求以此道施之。张君亦能了然于义译之病矣,故同时希望其勿坚守义译,而以为音译一无足取也。^{②6}

面对如此之多的反对之声,章士钊虽仍然主张音译,但立场已经有所修正。不仅肯定意译有其合理性,而且也承认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各有弊端,不能抱有成见,加以轩輊。这显然是一种退让。不过,这种退让并不能使章士钊的批评者满意,因为他引发的一系列译学理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澄清。1914年2月出版的《庸言》杂志发表了胡以鲁的长文《论译名》,对译名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也把这场论争引向了更为理论化的层面。

胡以鲁在文章开头便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

传四裔之语者曰译,故称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借用语。音译二字不可通也。借用语固不必借其字形,字形虽为国字而语非己有者,皆为借用语,且不必借其音也。外国人所凑集之国字,撰诸国语不可通者,其形其音虽国语,其实仍借用语也。借用语原不在译名范围内。^{②7}

胡以鲁认为翻译指的是意译,所谓“音译”并不是“译”,属于借用语的一种。有些民族语言比如波斯语、英语、日语等等,适合借用外语而不宜意译,但汉语则不同——“外语之防,则若泾与渭”^{②8}。他将晚近主张借用外语(实则就是主张音译)之观点分为六派:一、嫌象形之陋,主张借用外语者;二、利用外语之玄妙以严其壁垒者;三、以为非斯词必不足以尽斯义者;四、毋宁仍外语之旧以保其固有之分际者;五、此土所无,宜从主称者;六、述易作难,姑且因循者。从上文可知,第二、三、四、五派的观点都曾在章士钊的论述中出现。胡以鲁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读者可以很容易想到作者的主要批评对象是音译派的代表章士钊。

胡以鲁继而指出,天地之始,并无所谓“名”,名源于“德业之摹仿”,“草昧之人,摹仿不出感觉感情二事,则粗疏迷离之义,遂为名词先天之病矣……习俗既成,虽哲者无能为力,竭其能事,亦惟定名词之界说,俾专用于一途,或采方言借用语以刷新其概念耳”^{②9}。也就是说,“名”对于“实”的表现总是有限的,人们可以用语言对名词进行界说,但思想/事物进化迅捷,这些界说会很快变得陈旧过时。20世纪出现的西文学学术新名词,大多数都有着来自拉丁文的词源,与西方古典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名”未必能恰当地反映今天的“实”。因此胡以鲁认为:“知其不适而徒取音之标义,乃利其晦涩以自欺也,则非学者所当为。将利用其晦涩以免通俗之滥用也,其效亦不过一时,习用之而知其本义,则粗疏迷离之感,既同于意标,习用之而不知,则生吞活剥之弊,或浮于望文生义矣!”^{③0}

胡以鲁一方面从翻译实践出发,认为音译对普通人来说,磔格不能入,只是将译名神秘化,束之高阁,而已通外语者,则不需要这样的累赘。另一方面,他指出意译新名词也是国家教育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胡以鲁从文化本位主义的角度,指出音译或意译问题,其实质是如何看待本国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我国与西方文化的差距,并不像波斯与阿拉伯、英国与拉丁希腊、日本与中国那样大,中国文字“词富形简,分合自如,不若音标之累赘,假名之粗率,数千年来自成社会,其言语之特质,又独与外语异,其类有自然阻力若此,此借用语所以至今不发达于吾国也”^{③1}。他对于本国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的尊重,使他严厉批评对西方新名词的盲目崇拜,这些“淫巧浮动之国民”对于借用语不仅有新颖之感,而且有不胜崇拜之情,“一闻其名词,恍乎其事物,汹涌而靡遗,是所谓‘包晕之感’也”。所谓“包晕”,在胡以鲁看来是

将借用词神秘化：“为吾心自发之联想，为名词后起之义，及至习以为常，吾心之役于外语者，盖已久矣！使向者独立自营，虽事物非吾固有，而名与实习，固亦能如是也。名者实之宾而已，视为转移，何常之有？虽名词既成后，引申之义，不能无异同，然如吾国语者，易于连缀两三词成一名词，义之过不及处，仍得藉两三义之杂糅有以损益之也。”^②显而易见，他是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出发，来考量译法的选择问题。偏重译音还是译义，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文化、国民心理的重大问题。在文章的末尾，他再次批评那些“习于外而忘其本”者，甚至表示：“国语者，国民性情节族所见也。汉土人心故涣散削于外族者再，所赖以维持者，厥惟国语。使外语蔓延，陵乱不修，则性情节族沦夷，种族自尊之念亦将消杀焉，此吾所为涓涓而悲也！”^③在胡以鲁的批判背后，我们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痕迹。

需要注意的是，胡以鲁明确倾向于意译，并且制定了二十条译例，但他并不绝对排斥音译。他认为在有些情况下，不能采取意译方式的名词，亦可借用其音，所以又有十条音译译例。他还提出译名应该由各科专家组成学会，讨论抉择，然后由政府审定而颁行之。

由于胡以鲁深湛的古典学术功底以及对西文、日文的了解，《论译名》蕴含着许多真知灼见，无疑是当时“义译派”最具理论含量和学术深度的文章^④。棋逢对手，章士钊很快便在自己创办的《甲寅》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做出了回应。首先，针对胡以鲁不以音译为“译”的观点，他认为音译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章士钊从“译”字的训诂出发，认为《扬子·方言》中说：“译，传也”，“传”者既传其义，也传其音，所以音译并不是“借用词”，也是翻译的一种。章士钊再次强调自己虽然重视音译，但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并非绝对主张音译。因此，双方的立场并非不可调和。他重申意译的困难在于，意译实质上是对事物进行界说（下定义），这很容易引起长期的争论。为了摆脱这一困境，章士钊提出了新的方案，即将名与义分为两个方面，在翻译中分别确定。定义尽可以慢慢讨论，而名称则不值得纠缠。一旦确定名称，就可以少却许多口舌。与胡以鲁不同的是，章士钊认为政府不可能在确定译名的过程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为由政府审定而颁行，“此浅近习语，法诚可通，若奥文深义，岂可强迫？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以政府所颁，号为斯物，而鄙著即盲以从之，且政府亦绝无其力，强吾必从”^⑤。因此，音译仍然是减少争讼的最好办法，“惟置义不论，任取一无混于义之名名之，如科学家之名新原素者然，则只须学者同意于音译一点，科名以立，讼端以绝，道固莫善于此也”^⑥。

胡以鲁的文章如一石入水，激起无数涟漪。除了章士钊的答复外，其他读者也纷纷在《甲寅》发表意见，有赞有弹。有读者对章士钊表示支持^⑦，也有读者认为胡以鲁亦有道理。如吴宗谷就致信支持胡以鲁，认为逻辑一词在西文中已经泛滥，和名学、论理学一样，都只能表达“logic”的部分内涵，所以并无一定要音译的必要。章士钊则回应道：

则学为一事，名为一事。倍根斥雅里斯多德之逻辑为无裨于人知，乃斥其学，非斥其名。名者非雅里斯多德之所能独擅，而彼亦决无意独擅之。则不用其学而用其名，何害？亦既名同而学异矣，于是其名者率不过取为代表斯学之符，深造者各为定义，隶之于下，初不必问其名之含义何似。是故逻辑一名，能沿用二千年于欧洲诸邦，迄今未改，实以其为希腊死语，字体不见于诸邦之文，最适于标作符号之用也。^⑧

也就是说，逻辑学的内涵虽然发生不断的变化，但“logic”之名并没有改变，反而在各种欧洲语言中都是统一的，这恰恰说明只有在“logic”这样来自于希腊死语却一成不变的符号之下，人们才能进行有效的讨论。所以，章士钊主张在翻译各种自然科学之名的时候，也应该仿效西文

加“logy”词尾的方法,将动物学(zoology)译为“鑿尔逻辑”,矿物学(geology)译为“齐耀逻辑”,“最宜效法欧人沿用希腊已成之语,而不必在吾文觅字以求合”^③。

《甲寅》一卷四号又发表了容挺公的来信,继续与章士钊讨论。他也支持意译。因为“logic”和“economic”在西欧文字的原文中,已经不能涵盖今天逻辑学和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学术日新月异,而名称则没有变。如果意译不能完全表达原词的涵义,那么按照西文音译过来的“逻辑”和“依康老密”,也必然不能完全达意。为了解释音译词的含义,又必须同时加以说明,这更增加读者理解的困难。容挺公以日文为例,认为日文辞书中的人名、地名、物名以及精神科学名词很少有音译,因此从经验来说,音译终究不能代替意译。对于意译不能完全吻合原意的问题,他认为不妨“浑融含蓄以出之”^④,也就是说,允许有自由发挥和联想的空间,只要能够反映出原文的“最大部分之最大涵义”就可以。至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译名,经过进化公理的淘汰,最适合的译名将会留存下来。只有经过竞争,所谓“最大部分之最大涵义”才能得到保存。政府对译名的统一作用有限。只能是在学者自由撰述之后,政府从中取舍。那种由少数学者开会讨论学术用语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容还提出了自己的译例:

凡欧文具体名辞,其指物为吾有者,则直移其名名之,可毋俟论。其为中土所无者,则从音,无其物而有其属者,则音译而附属名。至若抽象名辞,则以义为主,遇有势难兼收并蓄,则求所谓最大部分之最大涵义。若都不可得,苟原名为义多方,在此为甲译则甲之,在彼为乙义则乙之。仍恐不周,则附原字或音译以备考。非万不获已,必不愿音译。^⑤

不难看出,他的设想与此前胡以鲁的方案极为接近。他认为,这一译例虽然和“五不翻”以及章士钊的观点有所冲突,但它的好处是“简易浅白”,易于操作。

至此,围绕译名问题的讨论基本告一段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章士钊的译学主张以及这场近代翻译史上的重要讨论呢?陈福康认为:“章氏在近代中国译论史上的贡献,主要就是带头展开了一场有关西方学术专名的翻译方法的讨论……他充分阐述了‘译音’的意义和优点,是对玄奘‘五不翻’理论的重大发展。”^⑥章氏观点的意义和价值仅止于此吗?这场关于译名的讨论仅仅是徒费口舌的意气之争吗?如果我们将之放在近代中国“国语”形成的过程中来看,恐怕问题要复杂得多。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重写/改写”,是服务于权力的文本“操纵”^⑦。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翻译从来就不仅仅是语言学、文体学或美学问题,而是与思想史、与观念对生活世界的改造有着密切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汪晖认为,严复对斯宾塞、赫胥黎、穆勒和斯密的翻译,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能动作用:

(严译)几乎穷尽了中国古典的语汇……这些典雅的文辞构筑出一个既熟悉又令人惊异的思想空间,我把它称之为“名的世界”。这个“名的世界”并不是概念的堆积,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于晚清士大夫和年轻一代的学子来说,它们如同符咒一般重新组织了他们的生活和世界。^⑧

汪晖强调,严复的“名的世界”,“不仅是中国人重新理解和控制自己的世界的方式,而且也是现代社会体制得以形成和建立的基本前提”^⑨。有趣的是,章士钊对音译的鼓吹,恰恰是以对严译的猛烈批评开始的^⑩。仅从这一点来看,章士钊的译学主张显然绝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

题。

鸦片战争以来,汉语的一大变化,就是“开始致力于获得一套表述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术语”^{④7}。其中音译和意译是两种主要的翻译手段。严复曾将所有翻译名义,分为译、不译两种:“译者谓译其义,不译者则但传其音”^{④8},其中的“但传其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音译。前文提到胡以鲁所说的“借用语”,指的主要也是音译词。按照今天语言学家的定义,所谓音译也即“袭用其音”,“就是通过音转写的方法将源语言的发音直接移入自语言中来”^{④9}。所谓意译,“即使用自语言的有意义的语素成分将源语言中的概念移入到自语言中来”^{⑤0}。

在翻译史上,音译和意译各有短长。由于汉字体系在表意上的特殊性,意译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占据着优势。意译使用了汉语中固有的语义成分,因此容易被受众接受,也更容易被汉语体系吸收。正如马西尼所说:

虽然,意译词和仿译词是根据外语原词创造的,但是它们在语音和句法方面和本族语的新词是一样的。因此,这些词的意义或者句法的来源完全被隐藏起来了。所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任何国家,这些词不会引起主张语言“纯洁”的那些人们的异议。^{⑤1}

但由于意译与自语言的密切关系,它有着先天的不足:“‘译’必须利用本语言的有意义的语言材料,所以先天性地存在着旧词新义的问题。即使是新的复合词,字义也会对词义产生一定的影响。”^{⑤2}由于采用汉语词汇进行翻译,这些词汇附着的原有含义,必然会对译词含义产生干扰。这种干扰有时来自字词本身,有时候则来自译者自身的成见^{⑤3}。如梁启超所说,译者之大患“莫过于杂烛孱杂主观的理想,潜易原著之精神”^{⑤4}。但无论如何,去除固有词的附属意义几乎不可能。由于严译多采意译,张君勱就批评他“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⑤5}。贺麟也指出:“平心而论,严氏初期所译各书如《天演论》(1898)、《法意》(1902)、《穆勒名学》(1902)等书,一则因为他欲力求旧文人看懂,不能多造新名词,使人费解,故免不了用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科学名词的毛病;二则恐因他译术尚未成熟,且无意直译,只求达旨,故于信字,似略有亏。”^{⑤6}可以看到,即使像严复那样使用古僻字甚至废字翻译英文词汇,也无法避免固有字义的干扰。

另一方面,当代语言学家指出,意译也隐含着这样一个认识论前提:

人类具有一个共同的意义体系,或者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意义体系,即意义的“原风景”……理论上或许没有绝对完美的对译,但是,随着交流的增加,人类总能找到一个最大的近似值。^{⑤7}

换言之,意译的潜台词是认为汉语可以通过自身的构词方式实现源语言的意义转移,人们也可以通过表意的汉语词汇(无论是固有词还是新造词)来理解其他语言。从今天的翻译理论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幻觉,它幻想“各种语言都是相通的,而对等词自然而然存在于各种语言之间”^{⑤8}。前文已经提到,章士钊对严复所憧憬的“名正理从”的翻译境界和知识秩序抱有深刻的怀疑,并且认为不可能以意译的方式达到精确的对译,只有音译才能准确地表达或接近源语言^{⑤9}。章士钊对音译的强调,显然是对这种认识论神话的不彻底的否定。时至今日,人们对音译(借词)的特质已经有了长足的认识:

借词有几个特点:借词依靠音转写形成,省时省力;借词形成时并没有被赋予意义,只是一个“空”的容器,因此没有旧有词汇体系的附属物。借词的词义由语言社会使用者共同充填,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原词的意义。主张借词(音译词)的人并不都是懒汉,他们往往是看中了借词在传达源语言意义上的这种特点。而借词的最大缺点也正在这里:词义的普及,定形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的词义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借词的实现与意义的转移是非同步的。即在我们最初接触到“沙发、迪斯科”或“哲学、电话”等借词时,词的形式并不能保证传递其所指示的意义,这是“借词”的最大特点。^④

问题在于,由于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不同,音译词进入表意为主的汉语体系是相当困难的^⑤。1926年,何炳松、程瀛章便已经提到译音的困难:“中外语音之不类,凡稍习博言学者类皆知之。汉音虽繁,终不足以应付译西音之用。即现在通行之注音字母,亦尚不足以尽之。”^⑥当代学者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马西尼指出:“由于汉语语音系统的不兼容性,使得来自西方语言的音译词在吸收过程中历尽艰难,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传播。”^⑦音译词的困难在于:“汉语的语音系统是不通融的。它不准备与外语音素去合并组成本系统已经包括的音素以外的新的连接体。由于语音和文字之间存在着一种形与影的关系,所以当借词准备吸收时,其语音方面必须与本族词相一致。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去看,语音与词的翻译用字之间有着一种形与影的关系。因此,同一个外语语音序列,可用不同的汉字来音译,这是由于各种方言之间的语音是各不相同的。”^⑧这也很容易造成音译词的混乱无序。不仅如此,音译词只是模拟源语言的音节,所用汉字本身不具有(也不应该有)任何意义,因此最初出现的音译词也只是一个拟音符号,本身没有意义,需要接受者不断为其填充。音译词从无义到有义,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⑨。这也使得汉语词汇系统接受音译词变得非常困难。近代翻译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严复“旬月踟蹰”所创制的音译词如“锡特”(城市)、“版克”(银行)、“劳叶尔”(律师),还是章士钊所孜孜提倡的“司洛辑沁”(三段论)、“斐洛索非”(哲学)、“扎斯惕斯”(正义),都很快被意译词取代,成为过眼烟云^⑩。

在此,以成败论英雄并无太多的意义,重要的是揭示章士钊何以如此执著于音译的深层动因。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解答。

其一,章士钊坚持对重要学术术语如“logic”、“justice”等进行音译,看上去似乎不仅固执,而且缺乏翻译实践经验,对汉语系统接受音译词的困难估计不足,但这是章士钊有意为之。他非常重视知识传达的本源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通俗和普及。在翻译用词上他也一再强调雅驯,并没有顾及译语如何被绝大多数国民接受的问题。即使那些被受众接受,已经约定俗成的译名,也必须经过学者的讨论。他又说,自己之所以主张音译,是因为“夫以音定名之利,非音能概括涵义之谓,乃其名不滥,学者便于作界之谓”^⑪。可以看到,他预设的读者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可以就音译名词先达成一致,而后再根据各自的理解,对译词的定义进行争论和界说。翻译在这里成为了硕学通人之间的问题,与中下层知识分子乃至一般百姓并无关系。此前傅兰雅等人也提出过音译的具体方法,但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名、地名。章士钊对音译的提倡则主要是围绕“逻辑”等学术术语,这背后正隐藏着他一以贯之的精英主义心态。

其二,章士钊对音译、意译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对汉语功能的认识。由于汉语表意体系与西方语言不同,汉语对外来词的接受有其特殊性。佛经翻译为汉语带来了一大批音译词,但

到了近代,人们对外来词的接受变成了以意译为主。这意味着源语言只有变为符合汉语构词习惯的汉语词汇才能被受众广泛接受,而汉语对音译词的容受能力无形中减弱了。章士钊以佛经“五不翻”理论以及“般若”、“菩提”等译词为例,不仅认为音译可以补中西文字差异之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被汉语所吸收。他在文章中大量使用“逻辑”、“隐达逻辑”、“题达逻辑”、“萨威稜贴”等佶屈聱牙的多音节音译词。尽管除了“逻辑”被沿用至今,其余努力几乎毫无效果,这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作为文章家的章士钊对汉语容受性、汉语词汇体系的柔软性(沈国威语)或者说汉语的弹性的积极期待。章士钊虽然在写作风格上深受古文传统影响,但他先东渡日本,再负笈英伦,丰富的留学经历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使他可以从更为开放、灵活的角度去思考汉语的功能。

其三,章士钊对音译的坚持,既是一种翻译策略,也是一种文化姿态。马西尼认为:

使用音译词,常常并非只是为了去表示某个名称或概念,似乎还有其他目的。例如,当没有理想的汉语对应词时,就会使用音译词,或者是把音译词当作是走向外部世界的通道(例如郭嵩焘)。在文字上,汉语和西方语言没有共同之处。因此,音译词是向读者表示外语单词语音的唯一方法,特别是在19世纪,那时中国人实际上还不认得西方字母,所以这种方法更为常用。^⑧

对意译的质疑,实际上是出于对源语言本义在翻译过程中被扭曲的担忧,而音译(以汉语模拟所借语发音)似乎代表更纯正的西方文化和更新颖的观念,正如“五四”时期,学生在街上高呼“德谟克拉西”、“赛因斯”,就是不用“民主”、“科学”^⑨。在这里,坚持音译其实代表了刻意凸显中西文化差异、强调西方文化异质性的文化立场。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主张音译就是主张汉语引进西方语言的发音乃至“全盘西化”,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主张意译就是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上讲,音译无疑更接近原义。因此,如果借用刘禾的话,意译意味着“一种文化经验服从于(subjecting)另一种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翻译或者诠释”^⑩,那么对声音对位的坚持则不仅仅意味着对“信”的追求,更意味着对两种文化彼此独立性的确认。沈国威认为:“‘译’与‘借’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存在着积极的造词与意义赋予过程,后者则不存在。”^⑪但是,章士钊主张的音译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消极。音译拒绝采用归化策略,而只是纯粹通过语音转写的方式表现源语言,这种看似消极的“有所不为”其实也是一种“作为”——既不以汉语词汇误读源语言,也不曲解源语言以迎合汉语,彰显的正是互不归化、彼此尊重的文化姿态。这显然体现了章士钊在民国初年对中西文化主体性和差异性的深刻认识。只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章士钊何以孤军奋战,坚持他那曲高和寡的音译法。

回顾章士钊所参与的“译名”之争,我们会发现翻译本身就是缺憾的艺术,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只能部分地接近原文,而不可能绝对完美地传达原文的内涵。正如钱钟书所说:“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⑫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注重音译或是坚持意译,都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近代翻译影响下的汉语已经是一种新的语言,它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8页。

② 严复《与张元济第八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7页。原文点校有误,现改之。

③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xii页。

④⑤⑦⑧⑨⑩⑪⑫ 民质(章士钊):《论翻译名义》,载《国风报》1910年11月22日。

- ⑥ 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页。因为严复的译作里经常夹杂有他自己的话,虽然引文出处是在《名学浅说》里,但从上下文来看,是严复自己的论述。
- ⑫ 秋桐(章士钊):《译名两则》,载《帝国日报》1911年8月9日。
- ⑬⑭ 行严(章士钊):《释逻辑——答马君育鹏、张君树立》,载《民立报》1912年4月21日。
- ⑮ 以吴汝伦、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对严译几乎都持肯定态度,即使梁启超对严译曾有微词,也只是对严译的过于古雅、不便普及,而非翻译的准确与合理。
- ⑯ 张礼轩:《致记者》,载《民立报》1912年5月11日。
- ⑰⑱⑲⑳㉑ 张礼轩:《论翻译名义》,载《民立报》1912年7月6日。
- ㉒ 章士钊:《张君礼轩论翻译名义函附语》,载《民立报》1912年7月6日。
- ㉓ 李禄骥:《论译名之一》,载《独立周报》1912年9月22日。
- ㉔㉕ 张景芬:《论译名之二》,载《独立周报》1912年9月22日。
- ㉖ 记者(章士钊):《〈张景芬投函·论译名之二〉附语》,载《独立周报》1912年9月22日。
- ㉗㉘㉙㉚㉛㉜ 胡以鲁:《论译名》,载《庸言》1914年2月15日。
- ㉝㉞㉟ 沈国威:《“译词”与“借词”——重读胡以鲁〈论译名〉(1914)》,载《或问》2009年第5期。
- ㊱㊲ 秋桐(章士钊):《译名》,载《甲寅》1914年5月10日。
- ㊳ 例如读者吴市就表示对章士钊的支持,认为按照玄奘的“五不翻”理论,逻辑一语,“兼跨多含、此方无、尊重三例之域”,是不应该意译的(参见吴市《通信·致甲寅记者》,载《甲寅》1914年6月10日)。
- ㊴㊵ 记者(章士钊):《论逻辑——答吴君宗谷》,载《甲寅》1914年5月10日。
- ㊶㊷ 容挺公:《通信》,载《甲寅》1914年11月10日。
- ㊸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 ㊹ 转引自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页。
- ㊺㊻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1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34页。
- ㊼ 除了上文笔者提到的对严复的攻击,章氏在回忆中又批评严复晚年翻译态度不甚端正:“七年(1918年),愚任北大教授,蔡校长曾将(严复)先生名词馆遗稿之一部,交愚董理,其草率敷衍,亦弥可惊。计先生藉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也。”(转引自王栻主编《严复集·编后记》,《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87页。)
- ㊽㊾㊿㉠㉡㉢㉣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页,第63页,第30页,第30页,第32页。
- ㉤ 严复:《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8页。
- ㉥㉦㉧㉨㉩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175页,第153页,第165页,第164页,第165页。
- ㉪ 本杰明·史华兹在谈到严复的翻译时说:“无疑,意译有时容易严重歪曲原义。但总的来说,造成这种歪曲的原因,很少是由于严复所使用的语言,更多的是由于他的先入为主的充满曲解的成见,正因为他的译著中贯穿着这种成见,所以使原著的意思发生了偏移。”(参见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 ㉫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罗新璋主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页。
- ㉬ 转引自贺麟《严复的翻译》,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
- ㉭ 贺麟:《严复的翻译》,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
- ㉮㉯㉰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页,第49页,第1页。
- ㉱ 何炳松、程瀛章:《外国专名汉译问题之商榷》,载《东方杂志》1926年12月10日。
- ㉲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0—701页。
- ㉳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9页。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小羽